

80 年代以来印尼、马、泰、菲四国的华侨

华人政策对华人经济的影响

王 望 坡

80 年代以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这四个东盟国家面向出口的战略和产业升级换代加速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促进了华侨华人的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过渡,华人经济实力开始快速增长,尤其在工业、金融和第三产业获得了长足发展,涌现出了一些华人大企业集团和金融财阀,如印尼籍华人林绍良的沙林集团、谢建隆兄弟的阿斯特拉集团、陈雄基的金轮集团;菲律宾华人吕希宗的“行裕行”;马来西亚的马联工业集团,森那美集团、李莱生的吉隆坡甲洞集团;泰国华人陈守民的赞利企业集团、谢国民的正大集团等等。

本文试图论述 80 年代以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四国政府涉及华侨、华人政策的新变化及对华人经济造成的影响。探讨华人经济是如何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化被动为主动,寻求生存与发展机遇的。

一、国籍政策、民族政策和同化政策对华人经济的影响

(一) 印 尼

1980 年 1 月 31 日,印尼政府发布第 2 号法令,指出“对那些根据过去有关国籍问题的条约或法令已成为印尼籍民但还没有取得合法证明文件者,给予法律上的肯定,发给正式印尼籍民证件”。^①2 月 11 日,又颁布总统第 13 号决定书,规定居住在印尼的外侨,如符合 1958 年《国籍法》第 5 条规定者,即在印尼出生或已在印尼连续居住 5 年,或断续住了 10 年,会讲印尼语,了解印尼历史,有固定职业者,可申请入印尼籍;并规定“对于原先是中国籍的申请人,只要附上由本人签名的放弃原来国籍的声明,就可以(申请入印尼籍)了”。此外,还将归化期限由原规定的 2 至 3 年缩短为 90 天。多数华侨纷纷申请加入印尼籍。据统计,至同年 4 月为止,印尼全国有 82 万多名华侨申请加入了印尼籍,^②华侨(包括“无国籍者”)只剩 30 万人左右。至此,印尼的多数华侨变成了印尼籍华人,绝大多数华侨、华人在政治上也认

同于居住国。

印尼政府国籍政策改变后,多数华侨通过正式法律手续取得了印尼籍民资格,华侨资本基本成为华人资本,增强了印尼民族资本的力量,印尼政府从而成功地把华人经济完全纳入了印尼当地民族经济的轨道,在法律上消除了种族隔阂,对华人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这使华人经济有了较好的出路,坚定了华人经济扎根于当地的决心,促进了华人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的进程,华人资本也在印尼的各个经济领域取得较大进展。

1. 商业:经营规模和范围较前有所扩大,已越出以前主要作为零售商和中介商的地位,较多涉足于大批发商的领域,销售网遍及印尼各主要岛屿,并与香港、台湾及东南亚各国华商维持密切的业务联系。

2. 工业:除经营纺织、印染、小五金、丁香卷烟等原有领域外,还从事采矿、锌板、化肥、制药等新兴工业部门,以及自行车装配、机动车辆装配、电器等新工业,此外还出现了从轻工转重工的趋势。

3. 农牧渔业:除继续经营种植原有热带经济作物外,还种植玉米、高粱、花生等作物,食品加工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也发展较快。

4. 金融业:目前华资私营银行约150家,其他尚有一些保险公司和外汇银行。华人金融业已形成大规模的、系统的金融信贷网络。

此外,华人经济在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及旅游业中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1990年8月8日,中印(尼)两国复交,两国政府重申不承认本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保护和尊重在本国居住的对方国家侨民的正当权利和权益。进入90年代以来,印尼政府仍然继续执行欢迎华侨归化的国籍政策,华人经济仍保持发展势头。

(二) 马来西亚

8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政府在民族政策方面,一以贯之地坚持马来人优先政策。

根据马来人优先政策原则,马来西亚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如规定金融机构优先向马来人提供低息贷款;各企业拥有的股权和职工比率,马来人须分别占30%和50%的比重;规定非马来人不得经营军工、钢铁、水电等重要部门。政府还规定,某些公司发行新股,须让马来人获得不少于60%的分配额。^③政府还强制降低非马来人在某些有限公司的股份。例如,1986年6月,乐富门公司按政府规定重组后,华人股份由原来的46%降至20%。

由于政策的导向作用,马来西亚的主要经济命脉和重要经济部门,已逐步控制在政府或马来人企业家之手。比如过去马来西亚有十多家商业银行,绝大部分为华人掌握,现已基本被收购,华人仅在沙撈越保留一家福华银行。

马来人优先政策虽然向马来人倾斜,但马来人在经营管理方面缺乏人才与资金准备,所以多半要与华人合作。许多中小华人企业家或具有一定管理能力的华人职员,利用这一机会,介入马来人创办的企业,执掌经营管理大权。为求发展,华人各界进行不懈的努力,政治上加强同各族的团结,经济上逐步改变以往独资、本族内合伙经营的旧方式,进行资本的联并,组织股份有限公司,发展同马来人、印度人乃至外资的经济合作,增加合资经营。因此,在马来西亚执行马来人优先政策的时候,华人经济仍有较大的发展。

进入90年代以来,马哈蒂尔政府虽然没有完全废除马来人优先的新经济政策,但已经很少提起如何贯彻执行这一政策了,马来人优先的政策有了一定的淡化,开始强调公平竞争,这

给华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三）泰 国

在东盟诸国中，泰国华人被同化的程度最深，泰国对华侨、华人的政策也最为成功。泰国政府向来认为，限制华侨华人经济力量发展的最有效方法，莫过于通过同化政策把华侨子女归化为泰人，这样华侨华人经济就变成了泰人经济。

泰国政府对华人的同化政策遵循两个原则，一是阻止新移民，二是放宽入籍手续。在移民政策方面，战后历届政府都实行阻遏中国移民的政策。1979年泰国政府重新颁布的《移民法》规定，每个国家每年移民的限额不得超过100名。^④应该说，泰国实行阻遏中国移民入境政策，在客观上是有利于推进其同化工作的。泰国实行阻遏中国移民入境的政策，对于限制华侨经济力量的新发展和加速当地华人的全面同化，是有深远影响的。

1975年7月1日中泰建交后，为解决华人国籍问题，泰国国务院决定进一步放宽华人入籍的条件，申请入籍者只需具备下列三个条件：1. 月收入在100美元以上；2. 能说泰语；3. 非政治犯。入籍后也可不必改用泰文名字。这便导致众多华侨申请加入泰籍。

1989年5月23日，泰国政策为了加速实行对华侨华人的同化政策，宣布放松禁令：允许1959年以前到中国大陆的泰籍华裔返泰探亲 and 游览。^⑤在此之前，泰国政府一直不准在泰国出生的侨生从中国大陆返泰探亲。

泰国政府通过不断的努力，同化政策取得了成功，华侨、华人已经融合于当地社会。华人经济也转变为当地民族经济的组成部分。泰国华人资本实现本地化，公开的华侨资本在泰国注册资本中所占比重很小，而且越来越小。泰国已经通过同化政策基本上达到了“经济泰化”的目标。华人所从事的职业遍及国计民生各个领域，在各个行业中都有相当份量的比重。华人经济已成为泰国经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彼此间水乳交融关系诚如经济学博士李国卿所言：“泰国经济如不能有现代化的发展，就不会有泰华经济之现代化，相反的，没有泰华经济之快速成长，也就不会有泰国经济的快速发展。”^⑥

（四）菲律宾

70年代中期以来，菲律宾政府放宽了入籍限制，简化了申请手续，积极鼓励华侨归化。在1975至1986年期间，约有20万华侨加入了菲律宾国籍。^⑦

阿基诺总统自1986年2月执政后，采取了更为积极的华侨、华人政策。1988年4月11日，签署了第324号总统令，公布了菲律宾移民局制定的“非法外侨合法化方案”，以解决1984年1月1日以前及部分在此之后来菲的非法滞留的外侨的合法居留权问题。该法案的实施，使数以万计的1984年1月1日以前及部分以后非法入境的华侨取得了永久居留权。

1995年2月28日，拉莫斯总统签署议案，准许未持有有效证件进入菲律宾的外国人成为合法居民。这项措施旨在使匿藏多年，做非法生意和逃税的外国人及其子女获得合法身份。估计将会有十余万黑市居民申请为永久居民，这批外国人中大部分是华人。该条例适用于在1992年1月30日拉莫斯上任前非法进入菲律宾的外国人。^⑧

大规模的华侨入籍，彻底明确了华人的归属问题。华侨一经改变国籍，能享有土著菲律宾人所享有的一切权利，置业经营不再受到菲化法令限制，而且归化的华人其资金一般较为雄厚，经营管理经验较为丰富，又有广泛的（包括海外的）经营、联系网络，有较强的经济

竞争能力。这些都对菲律宾的经济发展大有好处。

华侨经济在转化为华人经济的过程中,自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转入制造业的资本比重上升,传统上占大头的商业资本比重有所下降,进入制造业的华人资本发展较快,成为华人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随着绝大多数菲律宾华侨陆续取得当地国籍,老一辈华侨随着年岁的原因,纷纷将企业转交给第二、三代华人继续经营,使原来的华侨、华人资本更彻底地本地化。菲政府放宽华侨入籍的政策鼓励了许多华人转向经营工业、服务业等行业。可见,这一时期由于政府放宽华侨入籍以及其他经济政策的转变,使更多的华人有机会参与范围更为广泛的经济领域和经营活动,华人经济也从而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二、政府经济发展政策对华人经济的影响

80年代以来,东盟四国积极推行现代化经济建设,适应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实行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纷纷采取新的经济政策,鼓励国内私人投资,实行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引进外资。东盟四国政府都认识到,要充分动员本国的资源与人才,维护社会长期稳定,发展本国经济,必须相应地调整对华侨、华人的经济政策,限制和利用华侨、华人的经济力量。

(一) 国内经济发展政策

1. 印 尼

苏哈托政府执政后,逐步认识到利用华人资本、人才和经验发展印尼经济的重要性,因而对华侨、华人经济实行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其主要内容包括:动员华侨、华人提供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推动印尼经济的发展;促进华人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呼吁非原住民同印尼原住民合作,提高原住民的经济地位,不过多限制华人资本的经营范围。

1980年总统第14号及14A号决定书限制华人资本的营业范围,规定凡承包额达2,000万—5,000万盾的项目,只能由原住民企业家经营。5,000万—1亿盾的项目,原住民承包者可得10%的照顾。非原住民承包商中标,应吸收原住民承包商分包。^⑨过多的限制引起华人企业界的不安,促使他们把资金转向外国,在外国寻找市场,从而影响印尼的建设。1984年4月,苏哈托总统签署了总统第29号决定书,取消了1980年第14号决定书使用“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的提法,从而调动了华人资本参与国内经济建设的积极性。

1988年10月,印尼政府颁布了一揽子金融银行自由化的政策,允许外国资本及当地私营企业家创办新的银行,扩展分行,减少了国家干预。这一政策提高了华人企业家兴办银行业的积极性。据1990年3月的统计,在印尼私营民族银行协会登记的银行会员达84家,总资产为35.4万亿盾,其中90%为华人资本。到1992年7月,私营银行已增至178家,其中华资银行约150家。林绍良集团的“中亚银行”,1957年创建时,注册资本为10亿盾,分行2家,新法令实施后,1989年分行数突增至178家,1992年达到400家,银行总资产1992年6月增至115,204亿盾。^⑩新政策调动了国内储蓄,推动了国内私人资本投资,经印尼投资统筹机构批准的国内私人投资额,1988年为14.89万亿盾,1989年1月至12月中旬,投资额达19.59万亿盾,比1988年全年增长31.6%,^⑪投资项目也有明显增加,这其中,相当大部分为华人资本。

但是,印尼在执行利用华人资本的经济政策时,经常出现一些反复,对华人资本投资国

内经济建设的积极性时有挫伤。如1990年3月4日,苏哈托总统召集29位著名华人大企业家,要求他们将其集团所属企业25%的股份出售转让给印尼合作社。3月12日,印尼经济、财政和工业部部长根据总统讲话指示的精神,发出了“关于合作社拥有企业股份”的通告,要求企业家们采取行动,予以实施。^⑩要求股份转让给合作社,只针对华人企业集团,带有明显的歧视色彩,因此华人企业家纷纷调整资本的结构,向海外转移资本。

2.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实施新经济政策后,占华人大数目的中小资产阶级和华人劳动阶层成为新经济政策的最大受害者,华人的既有利益逐渐遭到侵蚀。有的华人干脆投资海外或移居他国,马来西亚的国内私人资本投资因此不断减少,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较大影响,1985年甚至出现负增长。针对这一情况,马来西亚政府在继续推行新经济政策的同时,从1986年开始对国内经济政策进行若干调整。1986年10月修订“工业协调法”,规定资本减少于250万元,员工少于75人的工厂,可免申请执照,也不必遵守新经济政策规定的股权、雇工、出口的要求。1986年颁布的“投资促进法”,规定除对新兴工业给予进一步优惠外,特别提出小型公司调整后可获5%的收益回扣,优惠期5年。1988年底,贸工部宣布从1989年起,推行小型工业奖励措施,政府还从东盟、日本发展基金中争取了将近9亿元,向中小企业提供大笔的优惠贷款。^⑪

上述措施的实施,对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华人经济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华人的投资信心因此逐渐恢复,华资占很大比例的国内私人投资额不断增加。国内私人资本投资,1989年仅35亿马元,1990年头10月,已达165亿马元,比上年全年投资增长271%。^⑫

90年代以来,马哈蒂尔政府开始实施新的发展政策取代新经济政策。1991年初,马哈蒂尔在其《马来西亚迈向前方》的工作报告中,提出马来西亚要在2020年经济上赶上发达国家的宏伟目标,将继续鼓励私人资本投资的政策。为了实现这一宏大目标,必须争取各个族群的支持合作,特别是华人的大力支持。

马来西亚政府华人经济政策的改善,为华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环境,华人经济仍会在当地经济发展中起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3. 泰国

80年代以来,泰国政府通过鼓励私人投资积极性的自由企业体系来积极推进工业化进程,减少在制造业部门的直接投资,向私营企业提供投资奖励和公共基础设施。泰国政府于1987年7月9日称,泰国在其出口成功及外国投资增加的刺激下,正推行改革,以促进工业增长。但要达到工业化的目标,必须有大量的私人投资,这相当程度上有赖于资金雄厚的华人资本的扩张。^⑬

1991年9月3日泰国政府通过了第七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计划(1992—1996年),要求发展经济、金融、财政制度和资本市场制度,使泰国成为区域性经济、贸易和金融中心;建立公平社会,缩小城乡差别等等。泰国华人密切配合泰国经济发展战略及重大的决策措施,率先实施这些措施。从国家经济建设计划的具体内容看,泰国华人不论在投资效益前景方面,还是外向型产业方面都十分乐观。

1990年5月21日,泰国总理差猜·春哈旺宣布,泰国自即日起取消对一切往来帐户交易的控制,同时放宽外汇管制。其主要内容是:增加汇出的外汇金额,延长汇兑的期限,放宽外币存款限额,增设外汇汇兑机构,简化汇兑手续和放宽对商业银行外汇经营的限制。

放宽外汇管制政策导致了向海外投资的企业家人数的增加,外国资本流入特别是公司借款和非常住居民的泰铢帐户已急剧增多。同时放宽外汇管制为商业银行创造了开设新业务的机会。

正因为泰国商业银行从放宽外汇管制中得到了诸多的好处,所以对现行的外汇放宽政策措施,泰国所有商业银行的负责人,无一不表示拥护。资金雄厚的华人金融财团,也利用这一大好时机,拓展业务,增强自己的实力。

4. 菲律宾

马科斯执政期间,菲律宾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优待办法,积极吸引外资,并鼓励菲律宾土著人民及菲律宾华人进行投资。华侨、华人同菲律宾人、其他外侨一样,都从菲政府给予的税收、借贷优惠中得到好处,为菲律宾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阿基诺、拉莫斯总统执政以来,政府经济发展政策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与发展。

1987年7月,阿基诺总统签署了“综合投资法案”,对国内投资及外来投资提供了一些新的奖励措施,包括给予新投资者以5至8年的公司所得税免税期,进口生产设备免除进口税,对购买本国的生产设备可以减免相当于进口同类设备进口税的其他国内税收,劳务费可从应税的所得额中剔除等优惠。

1992年8月,拉莫斯政府取消了长达40年的外汇管制,自1992年9月起,面向出口企业可以将其出口所得的全部外汇存入菲律宾境内的银行。

在上述背景下,华人不仅在与外资合作,利用鼓励国内外投资的有利条件,发展壮大了自己的经济实力,而且也成为投资国内经济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按菲律宾投资局的批准额计算,菲律宾华人的投资额1985年为1.12亿比索。比1990年为4.41亿比索,1991年1—7月为4.6亿比索。^⑩菲律宾华人经济在80年代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华人大企业占菲200家大企业中的40家,在200家大企业中资产占14.5%,营业额占11.2%,税后利润占11.1%。^⑪菲律宾华人企业家不但利用政府鼓励发展工业的政策把商业资本适时转向工业资本,而且在房地产、金融、保险、旅游服务业等新兴行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二) 引进外资政策

80年代以来,东盟四国纷纷把吸引外资作为摆脱经济困难,带动经济成长的一个重要途径,采取改善投资环境,争取外国投资等措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争取外国优惠贷款,鼓励外国资本及企业与国内资本及企业合作联营。

引进外国资本对华人资本特别有利。华人企业家历来是外来投资者的合作伙伴,这是因为他们有丰富的工商经验,有一定的资本和经济实力、资信良好、经营网络广泛、和当地军政官员或有关机构有良好密切的合作关系等优势。由于血缘、地缘、人缘的关系,港商、台商及其他国家的海外华人投资者,更是乐于与当地华商合作联营。而当地华人企业家为了增强企业实力,享受政府对外资企业的种种优惠,拓宽本企业与海外的联系,也十分乐意和外资合作。外资的大量涌入,客观上有利于华人经济地位的巩固和加强。

1. 印尼

印尼政府除鼓励外资与印尼国内资本联营外,还规定除少数大企业外,外国公司企业产品须由印尼公司企业代销,不得自行销售。许多外国公司为了将其产品打入印尼市场,获得可靠及稳定的经营与发展,而选择华人企业公司为他们产品的代理商、推销商及合作者。像

阿斯特拉集团（日本丰田汽车等）、陈雄基的金轮集团（日本三菱电器及薄玻璃板）这样的代理及推销商，前后有数十家之多。这些华人代理商，后来大部分和外商合资联营或建立工厂企业，成为华人大企业集团。

据 80 年代初统计，西方各国资本在印尼联营企业总数 685 家，其中与华人企业联营 236 家，占 34.5%；日资在印尼联营总数 206 家，其中与华人企业联营 95 家，占 46.2%；香港资本在印尼联营 104 家，其中与华人企业联营 45 家，占 43.4%。^⑩80 年代后，这种联营在资金规模，经营范围工程项目等方面，都有较显著的发展。

2. 马来西亚

1986 年 9 月，马来西亚放宽了外资股份所有权及其他方面的一些政策，规定 80% 以上产品出口的企业，外商可拥有 100% 股权；1986 年 10 月—1990 年 12 月间投资的新项目，凡产品 50% 以上出口，或雇用 350 名以上马来西亚员工的公司，外商可拥有 51% 的股权；外商可拥有工业及农业用地，也可租用工业用地，租期可达 60—99 年；延长免税期限，增加免税额，扩大优惠范围。1991 年 2 月，又对外资政策作了调整，鼓励外资企业投资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部门，对投资于这些产业的外资免征开发税。

在上述优惠条件的鼓励下，外资源源不断地涌入马来西亚，以所批准的制造业计划资本为例，外资投入从 1984 年的 7.18 亿马元上升到 1989 年的 86.5 亿马元，1990 年前 10 个月更达 169.1 亿马元。^⑪

马来西亚不少华人企业家在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同外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华人企业在同外资的结合过程中，利用外国资本，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及市场网络，发展壮大自身的经济实力。如骆文秀领导的东方实业是通过与日本本田公司的合作，取得经销权，兴办装配加工厂而发展起来的。

3. 泰国

80 年代后期以来，以港台资本为主的华人资本与泰国华人资本密切合作，在泰国掀起投资热潮。香港华商企业初期在泰投资以轻工业为主，近年来对房地产、科技工业以及交通建设等进行大规模投资，到 1993 年为止投资总额仅次于日本，居外资第二位；台商投资到 1993 年底，金额达 5.12 亿美元。

港商与台商在泰国华商的配合下大量赴泰投资，泰国华人也积极与港台投资者合作，如参与投资、招募员工就业以及各项相关业务。港台资本与泰国华资的合作渗透，既增强泰国华人的经济实力，也推动了泰华资本的国际化。

泰国华人经济实力的增长不仅受益于港台外商投资，在与其他国家外资合作中也受益匪浅。以日本为例，到 1988 年日本企业参与泰国合营或独立经营者已达 600 家之多，其中大多数合作对象是华人，象陈龙坚的暹罗机器公司，由原来一小钢铁行而发展成为拥有数十家关系企业的大集团，自日本引进机械、车辆及电机制造新技术，对提高泰国工业水平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4. 菲律宾

菲律宾政府于 1991 年颁布了菲律宾共和国第 7042 号法令“1991 年外资投资法案”，除了继续鼓励国内外资本投资外，对以前没有享受到优惠待遇的外资企业给予了开放国内市场的优惠，即面向菲律宾国内市场的外资投资，其投资比率以往一直限制在 40% 以下，自 1991 年 11 月起的三年内的此类投资，其投资比率可放宽到 100%。^⑫

拉莫斯政府为了加强吸引外资,延长了外国投资者租用土地的期限,最高可达75年。拉莫斯还下令将美军撤出后的苏比克湾转变为自由港和工业区,将克拉克空军基地开辟为经济特区,提供包括免税在内的许多优惠条件,以吸引外国投资,据菲律宾投资局统计,1993年上半年,外国资本投资总额是1.9893亿美元,较上年增加了38.6%,其中56.6%投资于制造业。^②

外商投资菲律宾时,往往选择与华人进行合资,这大大有利于菲律宾华人经济的发展。如马来西亚华裔郭鹤年兄弟在菲律宾设立的郭氏兄弟菲律宾物业公司,1993年与菲华裔仙美沱公司附属地产公司及苏达诺地产公司合作,共集资14亿比索,在马加地金融中心兴建40层豪华商业大楼。菲律宾华人金融财团也同外国银行建立了资金联系,如美国的大陆伊利诺斯银行和日本的三和银行,分别在黎刹银行持股30%和10%;在中兴银行的股权中,三和银行持有4.3%的股份。^③华人金融财团通过与外国银行的合资联营,既拓宽了融资渠道,又有利于提高自身经营管理能力。

三、结 束 语

80年代以来,印(尼)、马、泰、菲四国政府,都认识到只有充分动员本国的资源与人才,维持社会长期稳定,才能推动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调整华侨、华人政策,限制与利用华侨、华人的经济力量,是四国政府共同的政策。

促使上述四国政府调整对华侨、华人政策的原因还有华人社会自身的变化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改善等因素。中国政府制定的《国籍法》以法律形式否认双重国籍的存在,真诚地鼓励海外华侨加入当地国籍。中国陆续与东盟国家建交也是基于政府间在处理华侨、华人问题上某种程度的互相信任与理解。东南亚华侨、华人也认识到,他们的生存与发展取决于东南亚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只有融入当地社会,才是他们的根本出路。随着绝大部分华侨加入当地国籍,华侨社会开始转化为华人社会,华人的经济力量也成为当地民族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华人对当地国政府的效忠不同程度上得到当地国政府与人民的认可。

80年代以来,印(尼)、马、泰、菲四国积极推行现代化建设,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鼓励国内私人投资,积极引进外资。这些新经济政策目的在于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华人企业家亦借此良机,适时调整资本结构,促进资本的本土化,积极配合外资,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新贡献,也推动了华人自身经济实力的积累与扩张。

为了鼓励国内私人投资,四国政府相继采取减少行政干预、扩大私人资本投资行业种类和数额的政策。这些政策部分取代或修改了以往通过行政干预压制华商私人资本发展的政策,使华人资本投资与经营领域有所扩大。产业政策的调整推动了华人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过渡。在四国鼓励引进外资的政策中,吸引国际华人资本是一项重大内容。鉴于华人资本的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本国的华人资本是国际华人资本进入本国的最佳合作者,四国政府都不约而同地采取利用境内华人吸引国外华商资本的政策。而本地华人企业也在配合外资尤其是配合外来华资的过程中扩大国内外的经济活动领域,改善自身产业结构与经营水平,资本的高科技化与国际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

由于四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调整引发的对华人经济政策的变化,以及华人自身对此变化的配合,华人的经济实力有了不同程度的加强。在经济结构方面,已从传统的小商业、手工业

为主逐步发展成为多种现代化企业、产业并举的新格局。经营方式,亦从以前的独资,家族型企业向合股公司,跨国公司或控股有限公司过渡,资本的有机构成与国际化程度迅速提高,出现了一批资本雄厚、管理先进的跨国华人大企业集团。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四国政府在全力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对华人的经济政策不会有太大调整,利用为主,限制为辅的政策仍会继续,华人经济力量尚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注 释:

- ① (印尼)《罗盘报》,1980年2月28日。
- ② (印尼)《雅加达电讯》,1980年4月25日。
- ③④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广州华侨研究会编著《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人政策》,暨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9月,第73页,第91页。
- ⑤⑨⑬ (泰)《新中原报》,1989年5月24日,第27页,第74页。
- ⑥ (日)李国卿著《泰国华人经济的演变与前瞻》,台湾世华经济出版社,1988年4月第202页。
- ⑦ (香港)《亚洲周刊》(英文版),1988年4月1日,第14页。
- ⑧ (香港)《亚洲周刊》(中文版),1995年3月5日,第36页。
- ⑩ 蔡仁龙《印尼华人企业集团的发展与前景》,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22页。
- ⑪ (印尼)《专业之声报》,1989年12月26日。
- ⑫ 潘一定《印尼政府对华人作用的重新考虑》,载《东南亚学刊》,第7期,第103页。
- ⑭⑯ 周文宇《投资旺景将持续不衰》,(马)《工商世界》,1991年第2期,第9页,第9页。
- ⑮ 宋哲美主编《东南亚年鉴》,1983—87年版,(香港)东南亚研究所印行,第57页。
- ⑰ 日本贸易振兴会编,杨维中译《1990、1991年菲律宾的外资投资》,载《南洋资料译丛》,1992年,第4期第55页。
- ⑱⑳ (台湾)侨务委员会编印:《华侨经济年鉴》,1993年版,第172页,第168页。
- ㉑ (印尼)《时代》周刊,1981年3月14日。
- ㉒ 日本贸易振兴会编,汪慕恒译《1991—1992年:菲律宾的外资投资》,载《东南亚研究》,1993年第3期,第20页。
- ㉓ 厦大南洋研究所编《南洋研究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第114页。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

[责任编辑:王国平]